

# 武则天与神都二三事

余黎星 余扶危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摘要：**武则天在洛阳执政数十年，最后登上女皇宝座，武则天在洛阳的数十年间是唐代洛阳最辉煌时期，武则天与洛阳的许多历史事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洛阳武周时期历史离不开武则天。通过含嘉仓与丝绸之路就可以深刻了解武则天对洛阳历史的贡献。

**关键词：**武则天；洛阳；二三事

**中图分类号：**K87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1-0077-05

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洛阳为武周政权的都城，是武则天活动的中心，是她发号施令的地方。她的这些至高无上的特权，从辅政皇后到执政皇后，到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就是如此。因此，洛阳的大事无一不与武则天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就武则天与洛阳含嘉仓、武则天与唐代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两件事谈谈自己一些浅薄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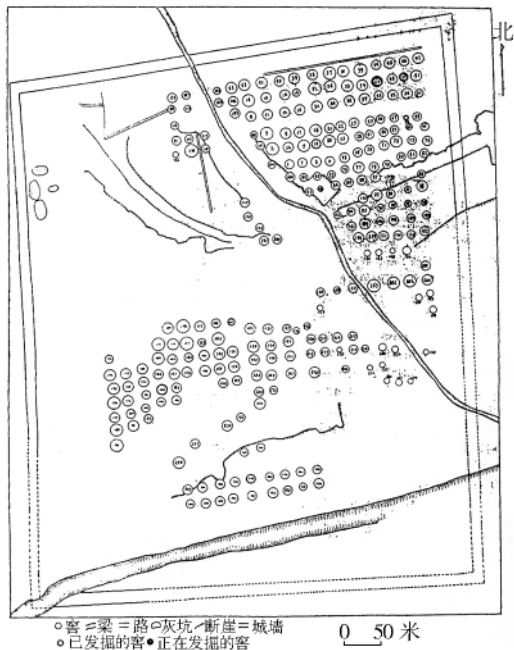
## 一、东都含嘉仓到武则天时期才成为真正的国家大型粮仓

隋炀帝营建东京（东都）时，在城内的东北部同时营建了一个小城，曰含嘉城，武则天与含嘉城一点关系也没有，与含嘉城无关，不等于与含嘉仓无关。因为含嘉城与含嘉仓虽同属一个地方，但前者为城，后者因储藏大量粮食而成为仓城。为什么说含嘉城在隋炀帝时只是一座城，还没有储藏粮食呢？

首先，含嘉城在史籍中没有确切记载在隋代已储藏粮食，成为了国家的大型粮仓，虽然杜佑在《通典》卷十二《食货》十二中把含嘉仓作为隋代大型粮仓，“隋代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把文献上均有记载的回洛仓忘了，而没有任何记载的含嘉仓却记上了，这显然是张冠李戴。

其次，凡隋代东都城的大型粮仓文献记载都比较详细，有修建时间、仓城范围、仓窖数量等内容。如洛口仓，一名“兴洛仓”。位于洛州巩

县（今县东北旧巩县）东面洛水东岸，因地处洛水入黄河之口，故有是称。大业二年置，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守卫<sup>[1]</sup>，全仓储米约有二千四百万石。又“回洛仓”，大业二年十二月置于洛阳城北七里，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sup>[2]</sup>。再如“子罗仓”在宫城内右掖门街，“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sup>[3]</sup>。隋代其他的“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黎阳仓”、“成回仓”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果含嘉仓是隋代粮仓的话，文献



洛阳含嘉仓城范围及粮窖分布图

上为什么没有关于它的记载呢？经过钻探，含嘉仓的规模远远大于“回洛仓”，“回洛仓”只有三百窖，而含嘉仓却有四百多个窖，更不用说子罗仓了。没有含嘉仓的记载，是史家的疏忽吗？不应该是。因为含嘉仓和子罗仓都在东都城内，为什么记其小而忘其大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含嘉城还不是含嘉仓城，还没有成为储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从含嘉城到含嘉仓城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因隋朝的短暂寿命而未能实现。

第三，隋末唐初，洛阳一带年年战乱，从当时战乱中的东都城看，城内不可能有含嘉仓这样的大型粮仓存在，不然隋末李密占据“回洛仓”和“洛口仓”后，东都城内严重缺粮，隋军一度夺回了“回洛仓”，不惜出动数千兵丁昼夜不停抢运“回洛仓”的粮食。这些抢运的粮食也只是杯水车薪，王世充为了解决粮荒，不得不用布帛向敌人李密换取粮食<sup>[4]</sup>，如果当时含嘉仓存在的话，李世民仅仅围攻洛阳才数月之久，城中乏食，“绢一匹直（值）粟三升，布十匹直（值）盐一升，服饰玩珍，贱如土芥……虽贵为公卿，糠覈不充，尚书郎以下，亲自负戴，往往饿死”<sup>[5]</sup>。如当时有含嘉仓，不要说围攻几个月，就是一两年，这些官吏的命运也不至于如此悲惨，因为含嘉仓可储五六百万石粮食。

第四，在隋代东都城内没有必要再置含嘉仓这样的大型粮仓。因为城内已有储粮二千万石和数百万石的“回洛仓”，无论是输长安和供东都之需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况且，城内有“子罗仓”，六十个仓窖中有粳米，从城外“回洛仓”运粮到子罗仓也是近在咫尺，何时用粮，何时再运也不误事。因此含嘉仓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五，隋炀帝修含嘉城的初衷我认为就不是储粮，而是存放堆积如山的布帛。当时东都城内的布帛十分丰富，“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细（井绳），然以作为烧柴”<sup>[6]</sup>。除当时的左右仓可以存放一部分外，另一部分只有放在含嘉仓内。因为城内有大片的库房，不然王世充占据洛阳时何以能在城中驻兵一万多人呢？

第六，在发掘含嘉仓的仓窖时，仓窖内出土不少刻铭砖，砖有年号，未见炀帝时的大业年号。碳十四测试结果也显示，年代为唐和宋。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炀帝修建的含嘉城是存放布帛的

库房而不是储藏粮食的仓城。只有唐代的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含嘉仓才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粮仓。为什么到这时才有含嘉仓出现呢？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唐王朝的需要。隋在东都城内的三处粮仓因隋王朝的灭亡也相继废弃。作为东西二京之一的洛阳，没有一个大型粮仓是不可想象的。唐王朝建立之初，因长安经济尚未恢复，粮食供应相对比较困难，因此常常就食于洛阳。太宗皇帝有三次，高宗有七次。当然不都是为了渡荒，但也有一定的因素在内，因此洛阳应该有储粮仓库。特别是到了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洛阳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从洛阳宫变成东都，变成东西二宅，由从东都变成神都这种变化说明，洛阳已经实实在在成为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中心和都城。都城应该有自己的大型粮仓，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唐王朝的太仓在长安灞附近。武周政权的太仓应该建在洛阳。这是武周政权的需要，也是政权的象征。隋唐王朝的物资供应主要依赖于东都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的物资主要通过大运河运抵洛阳。随时有“洛口仓”“回洛仓”进行转输。唐时这些粮仓已经废弃，急于建立这样一个大型的转输仓，如果不把这些物资及时运到长安，长安就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sup>[7]</sup>。又如《资政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德宗贞元二年（786）三月条云：“关中仓廩竭，禁军或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由此可见，江南漕米支撑了唐王朝的危艰，中晚唐是如此，初唐、盛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建转运仓是当务之急，而这个转运仓和隋代一样，也只能建在洛阳，不可能溯河而上将物资直接运送到长安。因为三门水险，常常船毁人亡。如唐初“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至京师，经砥柱舟覆，尽已其书”、“岁漕经砥柱，覆者几半”。这一切都说明不在洛阳建大型粮仓是行不通的。唐初统治阶级从隋末的战争史实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隋东都的两大粮仓都在城外，城内

只有一个子罗仓，一旦洛口、回洛被人占领，东都不保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唐建国以后，城内要有储藏粮食的大型粮仓，以保证城内粮食的供应和转输的需要，还可以应对突发事件。这一切，就是含嘉仓出现的客观因素，东都含嘉仓就应运而出现。含嘉城也就自然的变成了含嘉仓城。这种变化，发生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

第二太宗为这个转变奠定了必要的物资基础。

隋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确也是一个富有的王朝。隋亡以后，其所搜刮的民脂民膏还可以再用50年。而唐朝建立之初，加之自然灾害频繁，经济凋敝，粮食短缺。唐太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尽快恢复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让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首先积极推行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改革。他刚一即位，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租税。全国其他地区免除一年。同时省力役，保证农时，尽量减少征发，“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须务本，国以徭役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sup>[8]</sup>唐太宗还说：“轻徭薄赋，不夺农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sup>[9]</sup>有些非征不可的徭役，也尽量改在农闲。太宗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

其次太宗大力提倡戒奢崇简。他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薄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晚年立李治（高宗）为太子，随时训诲。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sup>[10]</sup>为了节俭开支，唐太宗采取了精简机构和官员的办法。贞观元年他下令并省了很多州县，中央各府官员，从2000多减为643人。唐太宗还以身作则注意节俭，从自身做起。他继位之后，仍住隋宫殿，且大部分都已破旧，他患有气疾，居住的宫殿很潮湿，有的大臣建议重新建造一座宫殿，也被太宗拒绝。为了减

少宫中的费用，唐太宗还下诏释放宫女，其中一次就释放了3000人。同时太宗还严禁厚葬，认为这样浪费太大，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地方官吏进贡的珍奇异物，太宗也下令禁止，以防扰害百姓<sup>[11]</sup>。由于唐太宗以身作则，在贞观初形成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sup>[12]</sup>。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再次，太宗十分注意人口的增长。唐代初年，人口大减，朝廷控制的户数不满三百万户，与隋朝的九百万户相差甚远。人口多少决定唐朝赋税收入的多少，因为赋税收入以人为单位。唐太宗为了有充足的劳动力来发展生产，以扩大剥削对象，采取了一些增加人口的措施。贞观元年（627）二月，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由州县官负责帮助他们结婚成家，因为家里贫穷无钱结婚的，由本村富户和亲戚资助他们完婚，以繁殖人口。同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当务之急，太宗还从国库中拨出大量资金，赎回被外族掠夺去的人口。贞观五年（631），一次就从突厥赎回八万人口。由于唐太宗采取了这些积极措施，人口得到迅速增长，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全国户数增加到380万户。

由于唐太宗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措施，社会经济得以很快恢复和发展。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出现了大丰收，粮价迅速下跌。武德初年，斗米三千文，贞观时期，斗米三文。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sup>[13]</sup>，贞观后期已经有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为含嘉仓成为国家粮仓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不排除当时东都城内有粮仓，但不是含嘉仓。含嘉仓应该出现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成为大型的国家粮仓、东都的太仓也应该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高宗武则天在唐太宗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行了一系列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耕的政策。上元二年皇后武则天曾向高宗谏言十二事，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徭赋”。<sup>[14]</sup>武则



天还把农业好坏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规定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官吏则予升奖,如“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严惩,“轻者年终贬考,重者非时解替”<sup>[15]</sup>。武则天也十分注意兴修水利,在她执政期间,水利事业有了蓬勃发展。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就有十九项水利工程。对于逃户,武则天实行了比较宽容的政策,规定逃户返业可以享受免租二年等种种优待。

由于太宗、高宗、武则天三位皇帝的共同努力,农业生产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全国垦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总产量迅速增长。盛唐时(武则天—玄宗开元年间)的经济显得格外繁荣,使封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和布帛。另外武则天时期,国家掌握的户口有六百万户,这一巨额的户口,保证了高宗武则天丰厚储粮的实现。基于这样的条件,含嘉仓在高宗武则天时期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东都和神都的太仓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另外高宗永徽六年在京东(洛阳)二市置常平仓,这也说明当时粮食很丰富。含嘉仓成为大型粮仓的物质基础已经完全具备。武则天为使太仓能更快更顺利将大运河运来的租粮纳入仓内,于大足元年开洛漕新潭,以置租船<sup>[16]</sup>,《河南志》也载有此事云:新潭“长安中司农卿宗晋卿,以通诸州租船,四面植柳,中有租场,集石其下,于上布土,潭立石柱,马吉甫为其文,钟绍京书,后潭中水浅,租船不能行”。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含嘉仓在高宗武则天时期才出现,并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当然也不排除在含嘉城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储粮。但这与含嘉仓即神都太仓的储粮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储粮。随着洛阳政治地位的下降,漕运改革的变化,含嘉仓的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太仓兼转运仓变为地方性的粮仓,到北宋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 二、唐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与武则天

“洛阳是否为唐代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是,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是与不是,都有一定的理由。我认为主张是或主张不是,都不是很客观,要取得统一的认识不难,因为它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路,是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路。这条路不同于民间的和一般的通商

之路,我国的中西商贸历史悠久,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与丝绸之路的性质有关。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联合西域诸国共同对抗匈奴。由此可见张骞开辟的从西汉都城长安到西域诸国的这条路是一条政治之路,是因为政治需要而开辟的路。因此丝绸之路的政治色彩一直贯穿始终。到武帝击败匈奴后,这条路才有了双重性质,一是政治之路,二才是通商之路,也就是后来闻名的丝绸之路。从狭义的意义上来讲,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国段的终点都是长安,这是历史所公认的。我认为这种狭义的解释也有道理,但不客观,不全面,因为丝绸之路不因西汉王朝的灭亡而消失,而是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历史中,因此丝绸之路不应该只有一个起点,而是哪个地方是都城,哪个地方就是起点。西汉灭亡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都在洛阳,丝绸之路也就东延至洛阳,洛阳就成为丝绸之路新的起点。起点变了,计算从西域到内地的里程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西汉时计算里程以长安为起点,如《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所载,大月氏国“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大宛国“去长安万二千二百五十里”;于阗国“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东汉时因都城在洛阳,丝路起点也在洛阳。计算起点也就东移到洛阳。《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所载,于阗国“去洛阳万三百里”;莎车“去洛阳万一千九百五十里”;疏勒“去洛阳万三百里”。

曾任西域长史的班勇所著《西域记》中详细记载了西域诸国到洛阳的里程。如“枸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安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阳万二千八百里”;“于阗国,居西域,去长安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等等。比《后汉书》成书早50余年的袁宏所著《后汉纪》,也有如此记载。由此可见,东汉是这样,曹魏西晋北魏又何尝不是这样。

东汉由于国内原因,光武帝曾多次拒绝西域诸国遣子入侍的请求,使与西域自绝65年,直到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始“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千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变通焉”<sup>[17]</sup>。东汉政府为经营西域,“屯田于膏

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于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路又再现昔日的繁荣。《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十七年，“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章和元年（87），“月氏国遣使献扶拔、狮子”。《后汉纪·孝灵皇帝纪》第二十三，建宁五年（172年）“春正月，车驾上原陵，诸侯王及外戚家妇女，郡国计史，匈奴单于，西域三十六国侍子皆全焉”。可见东汉与西域诸国政治关系之密切。

在商业贸易上也是一派繁荣景象，驰命走驿，商胡贩客，往来不断。“赛里斯人（中国人）即处此，其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之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服，光泽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决不求售也”<sup>〔18〕</sup>。关于曹魏、西晋、北魏之为东端起点本文不再赘述。

自东汉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之后，丝绸之路从此成为三重性质之路，即政治之路、商贸之路、宗教（文化）之路。佛教自东汉孝明帝时经丝绸之路传入洛阳以后，天竺、西域各地僧人纷纷也来到洛阳。《高僧传》多有记载。佛教自东汉传入洛阳后，洛阳成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北魏洛阳“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sup>〔19〕</sup>。“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sup>〔20〕</sup>。北魏永明寺，专门用以安置各国僧人，该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sup>〔21〕</sup>。有些外国僧人亦在洛阳立寺，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僧昙摩罗所立也”<sup>〔22〕</sup>。洛阳缙氏人佛学大师玄奘西行取经，于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达于京邑，谒帝洛阳<sup>〔23〕</sup>。高宗时义净去西域取经，回国后住洛阳大福先寺，此后印度高僧无畏三藏与商旅同次<sup>〔24〕</sup>。外国僧人还在龙门开凿造像龛。继佛教传入洛阳后，具有影响的一些宗教也纷纷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和洛阳，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水陆两途传入），有的还在洛阳修庙立寺。唐代南市附近修善坊有“波斯胡寺”，会节坊有“祆寺”，市内西坊有“胡祆寺庙”，北市立德坊有“胡祆寺”<sup>〔25〕</sup>。各种宗教的传入，赋

予了丝绸之路新的内涵，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隋唐以前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洛阳，同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唐代洛阳是不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呢？我认为不是，洛阳不是有唐一代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而是武周时期的东端起点。因为有唐一代总的都城是在长安。无论是东西两京的洛阳，还是东西二宅的洛阳都没有取代长安都城的地位，而只有神都洛阳才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武周时期的都城。事实也完全是这样。高宗武则天虽然不断经营洛阳，洛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始终没有能取代长安。高宗执政33年，来洛阳7次，只住了11年，仅占33年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的时间仍在都城长安。高宗在临死时也没有把洛阳当作都城，而是仍然眷恋都城长安，希望天地神灵多给他一二个月的寿命，能回到长安，在长安死了也没有遗憾。这足以说明长安是都城，那里具有正统地位和礼仪氛围。

在武周政权前的高宗和以后的玄宗时期，西域诸国也派使节到洛阳，朝拜高宗和玄宗，并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如高宗和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等，都有不少西域诸国参加。这些使臣到洛阳比之到长安的次数少得多。就拿日本的遣唐使来说吧，在唐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实际到唐者共15次，而15次中只有3次在洛阳，其他12次都是经洛阳到长安。由此可以说明，洛阳除武周时期为都城外，始终处于陪都的地位。随着武周政权的结束，洛阳的政治地位也一天不如一天。如中宗回长安以后，就死也不巡幸洛阳。玄宗巡幸洛阳共五次，从第五次（开元二十一年，733）以后，直到唐灭亡前唐昭宗被劫持到洛阳外，唐朝诸帝迄未巡行洛阳，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从此也可以看出，唐都城长期在长安。因此，唐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神都，只存在于武周时期，其他时期的起点在长安。武周不是唐，是一个新的朝代，皇帝姓武而不是姓李，都城在洛阳（神都）而不在长安。同时官吏名称等也不是沿袭唐而是另有新名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武周不是唐。

武则天执政50年，而居住洛阳长达20多年，洛阳在高宗和

（下转第90页）

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9] 黄万波、方其仁：《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

[10] 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3-1934年6卷；林名钧《广汉古代遗址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1942年3卷第7期；王家佑、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11][21] 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

[12] 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陈显丹：《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 《广汉三星堆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1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江章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分期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 范桂杰、胡昌钰：《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

古》1981年第6期。

[1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7]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管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9] 赵殿增：《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7年第10期。

[20] C14测定年代，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号坑测定数据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提供。

[22][23]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24] 孙华：《试论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赵殿增 陈德安：《巴蜀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的新进展》，《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

（上接第81页）

武则天的共同经营下，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尤其是武周时期，更是洛阳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则天女皇大展才华的时期，将贞观之治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又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对洛阳的贡献，武则天所做的大事，无一不与洛阳有关联。本文只就含嘉仓和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可能是一孔之见，不登大雅之堂，望大家赐教。

注释：

[1][2] 《资治通鉴》卷一八零，大业二年十月，十二月。

[3] 《大业杂记》。

[4]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5]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武德四年三月。

[6]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

[7][8] 《贞观政要》卷八《务论农》。

[9]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118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10][11] 李国珍、张家林：《中国盛世皇帝传》96，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

[12] 《新唐书·食货志》。

[13]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

[14] 《大唐诏令集》卷一零《诫励风俗勅》。

[15]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16]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17] 张显朗编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第一册30页，引罗马史家白里内所著《博物志》。

[18] 《洛阳伽蓝记序》。

[19] 《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0][21] 《洛阳伽蓝记》卷四《西域》。

[22] 《大唐西域记》卷一上。

[23] 《全唐文》卷三一九《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

[24] 《元河南志》。